

赵剑平文集

ZHAO JIAN PING
WEN JI

◎赵剑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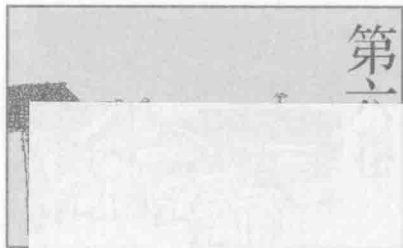
ZHAO JIAN PING
WEN JI

◎赵剑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赵剑平文集

第六





赵剑平，原名赵明鸿，1956年10月生，贵州省正安县人，仡佬族。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红岩》等刊物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其创作严谨，作品风格独特，具有浓郁的地域及民族文化色彩，富于思辨，传统表达中又有闪烁不定的现代意象，文字除内在的沉稳与节律，还格外显着活跃、生动，透着一种语言的张力。著有长篇小说《困豹》，中篇小说集《远树孤烟》，短篇小说集《小镇无街灯》，中短篇小说集《赵剑平小说选》《女县长》，散文集《挂在悬崖上的街》《赵剑平散文选》等。短篇小说集《小镇无街灯》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短篇小说集《赵剑平小说选》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报告文学《巴拿马诱惑》获“人民文学奖”特别奖，《獭祭》获贵州省“山花文学奖”，《杀跑羊》获首届贵州省人民政府文学奖。作品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及各类文学作品选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序

我是在2001年4月举行的“新时期黔北文学研讨会”上认识赵剑平的。剑平面相纯朴,为人低调。见过其人,再读他那两组在会上被众口一词称许的散文——《欧罗巴散记》和《走进神秘之地》,我似乎读出了那纯朴与低调下面深藏的一些东西,不能不把他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又过五年,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我虽因临时有急务未能出席,却从旁得知这部作品来之不易——从下笔到成稿、修改、出版,耗时竟用了近十七年时间。一部作品的分量,固不以创作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但由此却令我对这位贵州作家的扎实、坚韧印象深刻。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代,对那些甘于寂寞、从容沉潜的同道,我素来抱有更多的敬意。

一个作家的魅力,最终是要到他的作品中去感悟、去寻觅的。然而,倘若我们对这位作家的人生遭际、文化养成也有所涉猎,则往往有豁然开朗的惊喜。剑平出生在遵义大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镇。他父亲是区公所一名小公务员,他母亲是区供销社一名小职员。因母亲没有奶水,剑平一生下来就找了农村奶妈,先后吃了两位农民妈妈的奶水。此后又因为有了相继出生的弟弟妹妹,父母便把他送到了山山相连的另一个镇子,交给他祖父祖母照看。他祖父是地方上“打玩友”——流行于川南黔北一带的川戏坐唱的“统指”。他祖上在清朝年间从四川移民贵州。他祖父倾家荡产到四川拜师学艺,然后返回贵州教“打玩友”……这川黔间的游走,或许恰恰织就了他民间文化的根系?而他那位老祖母虽不能够识文断字,却是一名地道的贵州土著仡佬族歌手。可以想见,少年赵剑平,如何随着老祖母的歌声,去感受

人间百态、自然万象，又如何在这老祖母信手拈来，半是谜语半是山歌的“猜子”里，捕捉素朴与聪慧的光辉……赵剑平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地域，又属于一个时代。稍长，他又回到出生地父母身边。因为居住区公所，从镇上“破四旧”的火堆中，他翻捡出不少书籍，开始了他的阅读。应该说，同时阅读的，还有生活的艰辛——其时，他弟兄姊妹五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生活的担子对这个小公务员家庭来说是不够沉重的。剑平除了要煮饭、喂猪，他还要在假期跟镇上穷人家的孩子一起上山砍柴、背煤、运粮，常常“两头黑”。高中毕业，剑平跟那个年代所有的知识青年一样上山下乡。也许是生活对这位能吃苦、有追求的年轻人的报偿，他那时候就成了省劳模，代表全县知识青年出席省农先会。三年后，他填了遵义医学院的推荐表，却阴差阳错到了遵义师范专科学校文科班学习。从学校出来，他被分配到一所乡镇中学教书。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

不难理解，三十多年来，剑平的创作为什么始终跟他的人生、跟他的乡土、跟他的民族有着非同寻常的关联。而时代，又成了这种关联的不可或缺的背景。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作家生活阅历的同构。

民族、地域和时代，再加上命运的遭际，是铸造这位作家灵魂的洪炉。

赵剑平写得很慢，从容而认真。如前所述，那个不足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产生，断断续续用了十七年，而一个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呢，对剑平而言，花三五个月的时间也是常有的事情。事实上，剑平并不一直都是写得“慢”写得“少”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剑平先后用两个多月时间徒步考察芙蓉江和黔北天花坪原始森林，并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写出了六部中篇小说，发表在《收获》《小说家》《小说界》《清明》《红岩》等大型文学期刊上。后来，这些小说被贵州人民出版社收在一起，成为他的第一个小说集《远树孤烟》，作为“出头鸟”丛书第一本首推。可以说这本厚积薄发的“破土”之作充满了真情实感、充满了生气，是剑平走向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可否认，一个作家的“成名”，既是命运的眷顾，也是命运的灾

难。比如,《远树孤烟》的成功,确给年轻的赵剑平带来了“实惠”——家乡为此成立文联让他担任主席,并把他推举成为省人大代表、全国青联委员。他加入中国作协,省、地领导亲自关心,把他从县里调动到市里,不久,又把他安排到一个风景如画的县上挂职副县长深入生活……生活的浮泛干扰了作家的宁静与专注,因为我本人对此也有和剑平同样的感受,所以我认可这是他后来的作品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然而我也怀疑,赵剑平创作数量的减缓,是否仅仅这一个因由。

据我所知,这是一个要求自己不断为读者呈现新思考和新形象的作家。他的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少有重复自己的。没有新的思考,没有新的发现,他宁可袖手于前。

更不可回避的是,一个作家面对生活的惶惑。

遭遇这惶惑,是几乎每一个中国当代作家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虽然写得“慢”、写得“少”,但剑平的创作却并没有停下来。他后来发表的《白果》(《收获》)、《美丽的恐惧》(《青年文学》)、《梯子街》(《人民文学》),这些中篇小说跟他那一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合在一起成为《赵剑平小说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继他的短篇小说集《小镇无街灯》获得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后,又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而此时,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已经开始了长篇小说《困豹》的写作。我们从他关于《困豹》的创作谈《与生活一起创作》(《作家通讯》)可以看出,《困豹》之所以不能够一气呵成写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始终有一种矛盾和困惑。面对时代剧烈转型,观念更新、生活激荡、情感跌落、价值混乱,都给作家带来巨大的挑战而不得不使之陷入重新的思考与重新的抉择。实际上《困豹》十七年,这之间出现了数不清的缝隙。剑平没有放弃这些缝隙,而是在长篇、中篇、短篇这几种小说形式之间转换,他也因此才有短篇小说《白羊》(《人民文学》)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杀跑羊》(《上海文学》)获贵州省人民政府及地方上各种奖励。跨千年,跨世纪,剑平显然写得更“少”,也更“慢”。尽管如此,我们从他发表在《民族文学》上的中篇小说《大鱼》及短篇小说《事故》来看,他那种

对小说艺术的执着追求却是一如既往的。《事故》被《小说选刊》选载,《大鱼》有评论家撰文在《文艺报》发表,他们认为《大鱼》是那年中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一时期,剑平还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利刃》,这个东西虽然有些怪异,却是很耐人寻味的。也许小说创作的艰辛,不能再“少”,不能再“慢”,剑平似乎刻意对自己的创作做了一些调整,从发挥丰富想象力的小说文本创作转移到了严谨的纪实文体写作。近十年来,性情真率、急公好义的剑平作为一位地方文联的领导要上班,要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要跟各个文艺门类的文艺家打交道,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的生活实际上已经走样、走调,这其中虽然少了一些自我,却多了一些时代与社会的感悟。这种视野的变化虽然并非其本意,而客观上却使他对民生对乡土多了一些理解与关注。

剑平是当下中国我所认识的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几种文体间游走并能够取得成就的几位作家之一。他的散文不仅语言讲究,富有节奏感,而且取材广泛,从历史到地理,从人物到事物,不管旅游,还是风情,侃侃而谈,娓娓而道,却又常常充满奇崛,充满独特的哲思,传统中显开放,细微中显大气。除了前面提到的两组散文,他的那些单篇,比如《我在贵州贵阳府》(《人民日报》)、《茶说遵义》与《一个民族茶汤里的影子》(《人民文学·茶事二题》)、《红的启蒙》(《人民文学》)等篇,虽然有一些“奉命”的痕迹,却有很强烈的文化色彩。而《红的启蒙》、《红色背景上的歌与画》还收入一些权威选本。他的报告文学几乎都反映对他产生过冲击或者震撼的地方事物,一个年轻人因为一点小事情一口气夺走了七条人命,并能够冷静地清扫现场,进行反侦查,他由此想到了现代人性的变异,从而《惊悚》(《人民文学》)出现在他笔下;而六年前出现在中国南方的雪凌灾害袭击遵义,停电、停水,行路难,城市几乎成了一座死城,他又在键盘上敲出来《雪花不是花》(《中国作家·纪实版》)(原名《雪花,这个冬天你不再温柔》)表现这片乡土众志成城的精神;他家乡是中国农民打工进城的发源地,这些年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他气势如虹写就《大鹏一日同风起》(《中国

作家·纪实版》)的华章,讴歌时代巨变。剑平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报告文学不是调查报告,只要基本事实走向清楚,作家对细节的合理想象是可以的,尤其对那些发生年代久远的人与事,没有文学的参与,就不可能在古旧的历史资料堆中复活。基于此,他的《巴拿马诱惑》(《人民文学》)再现了一百年前民族工业品牌茅台酒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并斩获金奖这一事件的台前幕后,评委会因其在报告文学中运用小说表现手法授予他《人民文学》特别奖。追新逐异,这是文学永远的魂魄。否则,文学不可能成功打开人们有限的世俗空间,也不可能如歌德所说的“生命之树常青”。剑平作品从小说到散文,到报告文学,其实都贯穿了文学这一创造性劳动的基本精神。

也许我自己也曾搞过小说创作的缘故,我对剑平的小说更有一种偏爱。尽管剑平最早是通过他的中篇小说被文坛认可,而他的短篇小说其实也写得很精致。其中包括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些短篇小说,如《磨嘎》《钟声》《大树》《刳船》《死无对证》《小镇无街灯》《獭祭》《雾峡》等,短的一千多字,长的七八千字,依题材而定,很自由、很轻松,有写人的,有写事的,都写黔北乡土,视角独特,意趣横生,生活气息浓郁。传统叙事中有机融入现代表现方法,沉稳而跳跃,厚实而灵动。这些短小精悍的东西完全可以跟他的中长篇媲美。剑平的散文、报告文学,偶尔还有异国他乡的写作,而他的小说,却是地地道道的黔北乡土表达。他太执着于他的乡土,几十年来,他情有独钟地在这片土地上打滚儿,把那些喜洋洋的乡风乡俗滚在身上,把那些形象生动的山歌俚语记在心上,把那些醇厚绵密的人情事故消化在血液里,并把这一切都写进了他的小说。已经有专家学者注意到了,剑平的小说不仅具有一种文学的审美价值,而且还有一种文化的涵盖与标识。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关继新就曾经说过,要了解黔北,要了解仡佬族,其实只要读赵剑平的小说就可以了。最近,我又从网上众多解读赵剑平的文章中看见一篇长文,特别从赵剑平作品语言与民俗描写的角度论说,认为他的小说有给黔北民间文化建档立传的作用,真正

为日渐淡薄的黔北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

值《赵剑平文集》出版之时,我很愿意在这里对作家及其作品谈一点粗浅的感受。剑平生活积累厚重、艺术功底扎实,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作家。我预祝他在“慢”与“少”中始终保持一种坚守、一种从容,能够不断有所超越,写出更多脍炙人口、感人肺腑的篇章。

是为序。

《赵剑平文集》出版之际,我很愿意在这里对作家及其作品谈一点粗浅的感受。剑平生活积累厚重、艺术功底扎实,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作家。我预祝他在“慢”与“少”中始终保持一种坚守、一种从容,能够不断有所超越,写出更多脍炙人口、感人肺腑的篇章。

陈建功

2014年6月29日 北京

目 录

大鹏一日同风起	001
大道	045
巴拿马诱惑	090
雪花不是花	129
惊悚	146
铜像的塑造	173
藏在深山里的河	196
乡下干部	211

大鹏一日同风起

——正安县主城区改扩建纪实

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摘自李克强总理201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

引子：消失的凤凰

正安古称珍州，辖今绥阳、正安、道真三地。珍者，源东汉大儒尹珍之名。《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尹珍，字道真，生于荒野，自觉浅陋，北上中原，师从许慎、应奉，学成还乡以授，南域始有学焉。后，无地不称先师。珍州自唐始，近七百年光景，名夜郎郡，名信安县，名西高州，珍之名弃而兴，兴而弃，循环往复，仍以珍为贵名之。明玉珍踞蜀称帝，避讳，珍州更名真安州。雍正当朝，颂皇恩，歌德政，也表达一种愿景，复更名正安州，并归入贵州版图。

名正安，也另有一说。名者，符号也。虽符号，却也是一种引导，透示一种精神。以先贤之名名地方，不啻一种纪念，也算一种倡导。而尹珍绵延，终不过文风，兴与衰，到底由地方的命运、百姓的温饱来确定。地方太平而百姓满足，庶几文化昌盛而风气流行。而福之兴、运之旺，莫过于地理。正安古治所最早建滴水园，即今道真自治县旧城。再迁尹珍故里毋敛坝，即今正安县新州镇。又迁古风山麓，即今正安县城所在地。但先人们追求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为构筑一座理想的城池，治所复迁土坪，即今正安县土坪镇。而比较再三，终又回迁至古风山麓。一番折腾，先人们终于建立起来一种自信，古风山麓虽非八面来风，却有芙蓉江、桥溪河弯月托举，妩媚而优雅。大势所趋，而城池也当

讲究。城建山中,阳气十足,而东南西北,无阴不配。详察之下,竟也四方来财,有泉水四季长流。天意如此,循四水砌四井,城墙环绕,开东、南、西、北四门,四门有四井,安稳而富足。城建初始,取凤凰来仪之意,县城所在地即名凤仪镇。隔五十余载,众皆祥瑞,城池固若金汤,再无异动,命名正安,算给治所曲折的迁徙一个实在的注脚。当然,更重要的是画一个实在的句号。

但自正安县城落地起,凤凰,这种华夏民族古老传说中的神鸟,就成了继尹珍后,正安乡土文化的又一个符号。凤凰来舞,仪态万方。多少年过去,凤凰所含蕴的精神孕育一代一代正安人:郑光耀率众抗粮,唤醒一国之君体察一方民情;共和国总理题词授旗褒奖:户有万株桐,幸福永无穷;三百娘子军打工进城,拉开中国农民打工进城的序幕……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随着改革开放浪潮激荡神州大地,凤凰,这个符号在正安乡土承载了越来越丰富的文化内容,它意味着古老、意味着梦想、意味着锤炼、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勇往直前、意味着超越和升华……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古老的四门四井的格局被突破,街区顺着古凤山麓往前延伸,吞噬田园,挤占耕地,在接连不断的抱怨声中,西门膨胀起来,不可抑制地膨胀起来。有人在膨胀起来的路口塑了一只金属的凤凰,尽管凤凰塑得并不怎么样,却也在阳光中熠熠生辉,算给这座城市的精神指向一种提醒。

而不几年,这只金属的凤凰塑像便无影无踪了。

是塑像造型不够完美?

还是凤凰本身所代表的文化有某种缺陷?

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完成了西方国家用一百年时间完成的经济飞跃。时代列车高速前进,转弯抹角,强大的离心力,会不会把我们曾经引以为骄傲的东西,特别是农耕文明几千年来就一直伴随我们、成就我们的东西给抛了出去?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总之,这些东西被残酷地抛了出去。最后,我们从一个崭新的时代获得了一种新的文明,而同时,我们也可怕地获得了另一种东西,这就是遗忘与失落。

上篇

“师爷”进城

进入新世纪。

进入新千年。

跨世纪并不鲜见。而跨千年,却算是人生的大缘分。因为不易,所以才使人对光阴有一种特殊的理解。还是上一个世纪、上一个千年,李广勤从正安县城所在地凤仪镇来到正安县南大门——土坪镇,上遵义上贵阳的必经之地,从凤仪镇镇长到土坪镇书记,倏忽间,往事越千年,刚刚结束的县人民代表大会,又把他选成了县人民政府的一名副县长。从县城往基层走,谓之“下乡”。李广勤下乡,有人调侃“南大门的守门员”,其中也自然包含一种认同。守门员有多重要?关乎全局啊。担任三年土坪镇书记,他也因此养成了一种使命意识,一种充满眼光与担当的文化自觉。从基层往县里走,谓之“进城”。现在,他进城了。站在县委、县政府机关大院里,他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几年光阴,尽管跨世纪、越千年,他还是又回到了这个院子。当年,他从县一中一名政治课教员的岗位走进这个院子,到团县委,到政府办公室,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哪里出板报拉标语的,总要请他刷几笔。他因此成了这个院子有名的“师爷”。而现在,他并没有像传说中的“烂柯人”一般回到从前而不知东西南北。那些已经褪色的白底黑字,或者红底黄字,有的还是他的字,仍然粘在墙上,在风中旗帜一样飘荡,一刻不停地提醒着他,一百年也罢,一千年也罢,其实都是白驹过隙,瞬间而已。

“李县长!”有人热切地叫着,走近来一把握住了他的手。

他不知道这第一个迎接他的人叫什么名字,甚至也看不清楚他的面容。他脑子虚虚飘飘想着中国文字中国词汇有多深奥啊,用职务称呼一个人,总往高处喊,不会喊出“副”字来,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其实只是一名副县长,作为县长的助手,他只是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

但他没有想到会让他分管城建。土坪镇这些年计划生育、农网改造、特色经济,哪一项工作不是走在县里乃至市里前面。轻车熟路了,他却不

能上手,而班子分工偏偏让他分管城建。城建是什么?是天堂,还是地狱?是破,还是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而城镇建设究竟是手段,还是目标?人的生存与发展确定人的群居属性。群居产生秩序,也形成社会。城镇化关系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事实上,一座城市的面貌,或者直率地表达,除了它的街道、楼宇、市场,以及学校、医院这些设施,这些城市的面貌,便无从把握,也很难把握。城建不仅牵涉民生,还是一个地方的门面,因此成了各级政府工作的重头戏。李广勤琢磨,县里让他来管这一口,是对他的看重呢,还是对他的考验。他年轻,脑子灵活,办法多,做事有魄力,能够迎接任何严峻的挑战,这是与他共事的同仁同事几乎一致的评价。但刚刚从一个大镇党委书记岗位走过来的李广勤还是敏感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安排和使用,常常伴随着一种理念的转换。组织上看中了他哪一点?是他作为一个政治课教师积淀的理论素养?还是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正安人本原的文化情怀?抑或他曾经作为外派干部到发达地区大连市挂职自觉的落差意识与海派气势?正安城建不自今日起,但隐约中,李广勤意识到这项古老而艰难的事业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县委书记刘兴万在县委全委扩大会上一席话说到了李广勤心坎上——

正安城建走走停停这么多年,我们干也干了,看也看了,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小敲小打,四平八稳,跟不上时代发展对我们的要求,也与全县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差距太大。

李广勤那时候还在县城所在地凤仪镇当镇长。

一条文化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年年提建议年年写提案,开工了,却没有进度,有人算了一下,就是一只蜗牛,十年了,从北到南,一公里远,也爬了五个来回。可有什么办法呢?房屋拆迁不了,地征不起来,一条笔直宽广的大道终究停留在规划图上,中看不中用的彩虹而已。高原山地的意识,其实就是路的意思。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路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也展示一个地方的形象。早在改革

开放初期,县委、县政府想修一条路到老街,方便客人到招待所。吃饭、睡觉,天经地义,总不能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让客人走到招待所。可几幢老房子当中一座,成了真正的拦路虎,谁也动不了。原因很简单,有一个拆迁户是县里一位老领导的亲戚。而十年文化路,漫漫征程,牵涉的拆迁户更多,老街坊,老熟人,还有现任的领导干部,抬头不见低头见,磨不开情面,也只好一拖再拖。拆迁难,而城建却不可能不搞。大家把目光转向了没有拆迁的上坝。顺西门河往文家寨延伸,在田野上拉出来两条街道,然后将两旁的土地拿出来转让,变现支持水电路“三通”。而土地便宜,一百多块钱一平方米,却没有多少人问津。最后,还是县里做工作,才将烟草公司、信用联社、工商局这样一些实力企业、职能部门引了进去。虽然没有找到多少“开发”的感觉,但毕竟向前迈了一步。小小的成功,算正安城建一次热身。新区建设,土地资源捉襟见肘,大家又把目光收回来,重新打起旧城改造的主意来。

城建不是简单地修几条街造几幢楼,而是事关民生。民生搞好了,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老百姓居住条件改善了,就是我们最大的面子。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通过城建,提高正安人民的幸福指数,就是我们崇高的追求。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到位,相信老百姓会理解我们,会支持我们,我们没有必要怕眼怕洞。

一直拖到世纪末,历经五任县委书记:李冠炜、吴强华、赵明刚、李显国、程兴念,每一任县委书记都做了艰难的推动,仿佛给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新千年一个交代,文化路好啊歹啊,上下左右都筋疲力尽了,才算“打通”了。这条正安城建史上真正有一点现代味的街道算给正安县决策层上了一课,几乎所有班子成员提到文化路,都要用“打通”这个字眼,不说“完工”,也不说“修通”,或者“开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太沉重了,弹簧超过弹性限度,便积重难返,结果哪怕成功,竣工典礼盛况空前,高杆灯照耀辉煌,行道树遮阴纳凉,却让建设者并没有痛快淋漓。但打通文化路,却给沉闷局促的正安城建撕开了一道口子,这口子使正安老百姓

看见了另一片生活的鲜亮,也使正安县决策层一班人感到一种慰藉,从而打起精神,调整思路,开始以一种责任和担当启动了旧城改造。

整个城建旧城改造是关键。几门几街,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多,晴天怕火,雨天怕水,不改变,不改善,情何以堪。这方面,周边几个县走在了我们前面,它们的旧城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百年大计的事情,我们也不能盲目。后有后的优势,后发制人,后来居上,这是完全可能的。

东西门改造算正安县主城区改造的突破,却是正安县决策层义无反顾、迎难而上,面对旧城改造的开场白。东西南北四门,西门街最短,房子也最少。而跨十字口连接东西门的大片地带,则国家单位多。遵循从易到难的原则,先把事情做上手,形成阵势,才会越做越顺。即便如此,东西门改造也牵涉四百三十九户人家拆迁。本地人却不过情面,遵义下派正安的副县长罗其方担任指挥长。罗其方人年轻,有办法,有魄力,整个项目虽然艰难,却还是被他一步一个脚印推向前进。整个东西门改造总的原则是“包”,即从拆迁,到安置,再到建设,都由政府包揽。而拆迁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保”,即利用亲戚、朋友、熟人关系,县直机关一个干部对接一个拆迁户,保证做好工作,圆满完成拆迁任务。真正万事开头难啊!黔北民间掀瓦片、造房子,从来就是最伤心的事情,有人上省里、市里上访,有人上街游行,有人在十字口搭凉棚静坐,有人整天跟在罗其方屁股后面要死要活……而骨头再硬,也还是要啃的。结果连被称为“灭火器”的政法委书记徐光华都感叹:“旧城改造真不是人做的活路。”而波涛翻滚,终究也还是波澜不惊。只是整个东西门改造走向尾声的时候,政府投入三千多万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但没有收回来,还背了一千多万元的债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政府到底收获了什么?

社会进步,城市化是必然趋势。只是我们要算账,不但要算政治账,还要算经济账,算文化账。只有把这些账算清楚了,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才会面向未来,找准我们的位置,发挥

我们的优势,把我们的工作持续健康推向前进。

李广勤脑子里放电影一样过滤当代正安城建事业的发展历程,耳边却响起来一种激情而坚韧的呼啸,这让他像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一下就找到了自己的阵地。以城换城,以旧换新,以小搏大,是坚守,还是进攻?一切服从战势的需要。这里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一定要赢——从赢每一次战斗,赢得每一个战役;从赢每一个战役,最终赢得整个战争。

招与引的玄机

很多事情就像一曲交响乐,尽管有混响,却始终保持主旋律,而且一开头就定了调,单纯明净,一下就指向过程,指向高潮,指向结局。作为正安现代城建具有破题意义的文化路建设,李广勤对它的琢磨不是现在才有的。虽然主城区的建设都是县里抓,但他那时候作为县城所在地凤仪镇镇长,眼皮底下,却是怎么也绕不开的。为什么不叫别的路?偏偏叫“文化路”!正安在东汉时期出了一个“无地不称先师”的尹珍。可这条路跟“尹珍”有什么关系呢?新街新路,既没有一点历史文化痕迹,而除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图书馆,也没有像模像样的文化设施。太讲文化,文而不化,到后来斯文扫地,居然折腾了十多年。

但此时此刻作为城建指挥部指挥长的李广勤觉得这其实是有玄机的。万事万物,由表及里,真正要认识到位,有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因此先人才有话留下来:久等必有禅机现。城建这项事业终究是现代社会的幸福创造,而幸福,终究也还不过是现代人生活的感觉;而这,恰恰又应了那句经典:“诗意地居住。”县里为什么分李广勤管城建一块?他现在总算明白了几分。外地外乡的领导依靠政策、依靠魄力,打开局面、撕开口子,虽然政治上赢了,老百姓也得到了好处,可经济上却亏了。而现在,他这个本地本方的“师爷”,县里对他的要求却是哪一方面都不能输,要做彻彻底底的大赢家。事实上,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没有经营理念,只依靠财政投入,城市建设也不可能长足发展。而普天同庆的欢喜局面,李广勤知道,只有文化的力量才能实现。他生于斯、长于斯,跟这片土